

探討社會資本應用於發展綠色經濟之角色

張瓊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文章資訊

接受日期：2018.08

關鍵詞：

- 分享型經濟
- 包容式
- 社會資本
- 循環經濟
- 綠色經濟

內文摘要 (Abstract)

綠色經濟為近年國際間為了永續發展而倡導之經濟發展模式，其所倡議之目的在於改善人民福祉和社會公平。國際間關於綠色經濟之報告強調包容式的發展，除了對自然資本、綠色人造資本之投資外，另應重視對人力資本，以及社會資本之投資。國內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提出之「推動綠色經濟方向與策略」中，分就五項資本以討論規畫方案，社會資本即為其中一項資本。台灣和國際組織間對於如何運用社會資本發展綠色經濟的規劃是否有所差異？差異何在？本文以信任、社會網絡、價值觀與規範等三種類型之社會資本作為架構，比較分析台灣與國際組織對於以社會資本發展綠色經濟之規劃在評估面向與指標方面之異同。最後嘗試釐清台灣在規劃發展綠色經濟時對於如何運用社會資本之討論是否充分，並提出改善建議。

壹、前言--為何發展「綠色經濟」需要「社會資本」？

綠色經濟一詞以Pearce、Markandya和Barbier（1989）所著綠色經濟藍圖（Blueprint for Green Economy）較為環境經濟學界所熟知，其意指經濟發展應由環境汙染嚴重的褐色經濟轉為環境、經濟與社會平衡之綠色經濟。直到2010年以降，透過聯合國相關組織與歐盟等國際團體之宣揚，對於綠色經濟的討論和政策的連結又更拉近一步。綠色經濟是201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Rio+20）中所討論主題之一，而聯合國、世界銀行和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所出版的綠色經濟報告亦皆道出綠色經濟有潛力促使經濟體達成永續發展（Borel-Saladin & Turok 2013）。綠色經濟在許多歐盟所政策與計畫中亦具有策略性之地位，包括歐洲2020策略（Europe 2020 Strategy）、領導歐洲至2020年之環境行動計畫（7th 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正在執行之歐盟研發計畫（Horizon 2020），以及運輸和能源等部門別政策。但如同對於永續發展是否可行之疑問，綠色經濟是否為一可被落實的典範，亦受質疑（Brand, 2012）。Hamdouch和Depret（2010）則認為固然資金來源有其重要性，但成敗關鍵在於政府所提供政策之設計、時間點與整合等。Barbier（2011）指出綠色經濟無法確保永續發展，除非能克服內化永續概念和資金來源等兩項挑戰。

除了政策研擬與時機外，內化永續概念、克服資金來源等兩項落實綠色經濟的關鍵可借力於社會資本。什麼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在Jacobs（1961）和Loury（1977）已見介紹，而Bourdieu（1986）、Coleman（1990）和Putnam（2000）則使此概念更為人所知。Bourdieu

(1986) 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個人資產，著重於個人參與團體所獲取之利益；Coleman (1988; 1990) 認定社會資本為社會互動下的集體利益；Putnam、Leonardi和Nanetti (1993) 則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組織所具有如信任、規範、網絡等特質，透過協調集體行為，以增進社會運作的效率。本文為操作之考量，採取Putman et al. (1993) 之定義。該三項特質闡釋如下：

首先，社會信任端賴長期互動而得以形成。Hirschman (1984) 將信任認定為資源，且此資源隨著使用而增加。溝通和互動的品質、一定程度的相依，以及對於反應在決策和行動上的知識和價值的認知等，亦關乎信任 (Wagner & Fernandez-Gimenez, 2008; Davenport、Leahy、Anderson & Jakes, 2007)。Davenport et al. (2007) 亦指出模糊的溝通、不充分的參與、受限制的權力、歷史上形成的怨懟、衝突的價值觀、緩慢的進度、知識的鴻溝、缺乏相關意識，以及人員的更替等，皆限制了信任之建立。

其次，社會網絡涵蓋水平和垂直兩種類型，水平網絡是地位和權力等級相近者之間的串連，垂直網絡則是等級不對等者之間的串連 (Putnam et al., 1993)。水平網絡又可細分為對內連結型 (bonding) 和對外連結型 (bridging) 兩者，對內連結型多是指家人和好友之間的緊密關係 (Granovetter, 1973)，對外連結型則指熟人、同事和組織機構之間正式和非正式的關連 (Putnam et al., 1993)。

再則，規範和價值觀通常是和將團體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有關。儘管社會資本有這些潛力，但仍有其黑暗面 (Putnam, 2000)。首先，社群本身會限制個人自由，且無法容忍某些行為；其次，具有共同的敵人是形成社會資本最簡易的方式；再者，同一項社會資本可能有利於一類的行動，但不利於其他的行動 (Coleman, 1988)，比如說有些社群內對內型社會資本可能阻礙對外型社會資本的形成，反之亦然。

社會資本一方面可降低制度方面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尋資訊成本、議價成本、執行成本，並減少內耗、提高立法與行政效率；二方面有助於增進社會公平和環境保護之效能，是僅依賴人造資本或管制所難及。社會資本在經濟發展課題上往往不是被重視的一項資本，然而這項資本卻也是被認定如微型貸款 (Dowla, 2006)、社會企業 (Laville & Nyssens, 2011) 等經營模式之重要投入，有助於同時提升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歐洲環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4) 亦指出綠色經濟這個發展模式有賴於眾多經濟活動產生長期之改變，而此改變範圍若要夠大，即需社會價值觀之轉變。

既使社會資本具有前述降低交易成本與影響典範移轉的潛力，其在經濟發展相關文獻中通常並非主角，但獲關注 (Perkins, Radelet & Lindauer, 2013;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然而在實際經濟發展策略之制定中，卻不多見對於社會資本之投資與維護，發展策略仍多著重投資於技術創新，近期頗受關注的循環經濟亦然。人類經濟社會在資源效率方面透過技術進步的確大幅躍進，但這些效率改進離改善環境回復力、降低人類所面臨的風險等面向仍有段距離。

UNEMG (2011) 在邁向均衡和包容式的綠色經濟報告 (Working towards a Balanced and Inclusive Green Economy) 中強調綠色經濟的核心即是為了改善人民福祉和社會公平，在發展綠色經濟時，除了對自然資本、綠色人造資本之投資外，另應重視對人力資本，以及社會資本之投資。Stiglitz、Sen和Fitoussi (2009) 亦建議人造資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等存量皆需用以衡量未來經濟生產力與人類福祉。探討社會資本之運用與投資有利於降低對財務資源投資之依賴，並助於克服前述Barbier (2011) 等學者所提對於綠色經濟發展在財源方面所面臨之挑戰。而歐盟自省近年雖在資源效率方面有所改進，但和將這些效率提升轉換為改善生態與降低人類所面臨的風險之間仍有段距離。綠色經濟應該在生產與消費系統中進行根本之革新，以求符合人類之基本需求。因此，綠色經濟不僅是供給面的議題，以減碳

為例，發展替代能源和提升能源效率皆是供給面所能著力，但消費習慣的改變則是需求面的議題，亦與社會資本有所關聯。

為理解台灣在2013-2014年期間對於推動綠色經濟的規劃在運用社會資本之討論是否充分，本文擬針對國際組織與國內對於運用社會資本於實踐綠色經濟之評估面向與指標進行比較。比較文獻時所採用架構為社會資本三面向—信任、社會網絡，和規範與價值觀。文獻為立意 (purposive) 選取，僅針對提及社會資本之綠色經濟相關規劃報告進行檢視。茲以比較之文獻僅限於綠色經濟規畫中提及社會資本的角色者。例如：雖然歐洲環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3) 在其「歐洲邁向綠色經濟之路」報告中列出了2010年到2015年環境面的目標及對應指標，其中並包含國內在綠色經濟規劃中所倡導之永續消費與永續生產等面向，但歐洲環境署這份報告中未見任何對於社會資本之討論，即不歸入分析文獻之列。

至於國外文獻之選取以國際組織之規劃為主，不選取個別國家以資比較。就常援以和台灣相較之韓國與日本為例，兩國對於發展綠色經濟仍多是以設施和基礎建設等人造資本投資，以及財政刺激政策為主。韓國自2008年起實行的綠色成長國家策略 (National Strategy for Green Growth) 目前已進入第二個五年期計畫，雖然計畫中提及治理和國際合作，但未論及如何運用社會資本推動此計畫。日本2009年公布的「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政策大多還是攸關建設等人造投資或是保護自然資本，雖然該政策對於社會資本亦有所討論，包括擬建立區域性綠色社群，例如以回收為主軸的社會，即展現投資社會網絡之規畫，但亦言明此規畫之執行須仰賴財源。爾後2012年到2014年的三版環境白書中皆提到以綠色經濟為主要努力目標之一，相關指標包括參與團體的數量、國民擁有相關意識之比例等，亦僅限於此。

據此篩選國際組織相關報告共計六份，包括聯合國環境管理小組 (UNEMG 2011)、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2011)、國際勞工組織 (ILO 2012)、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2011)，以及歐洲執行委員會 (EC 2010) 和歐洲環境署 (EEA 2014) 等。台灣方面則援用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綠色經濟方向與策略」和該委託計畫之期末報告。

貳、 評估社會資本於實行綠色經濟之面向與指標

指標對於政策之推行具有導引之功用，以下分就國際與國內對於社會資本在綠色經濟發展中的評估指標與面向進行討論。

一、國際組織

聯合國環境管理小組 (UNEMG)、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國際勞工組織 (IL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以及歐洲執行委員會 (EC) 和歐洲環境署 (EEA) 曾針對實行綠色經濟所應採取的社會資本之面向與指標提出建議，整理討論如下。

規範與價值觀在國際報告中的體現多是關乎保障基本權利和促成使用型態轉變，其中以 UNEMG (2011) 之討論最為詳盡，其宗旨在於強調民眾參與對於綠色經濟發展之重要性。該報告在應用社會資本於發展綠色經濟一章即開宗明義指出--綠色經濟的發展應在於改善基本人權，包括個人與團體可獲免除之權利 (freedom from)，以及應獲取之權利 (right to)。為達此目的，應仔細檢視經濟成長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並確保個人與社群能充分具備參與決

定經濟成長的方向以及隨之所帶來的效益如何分配等項目之能力。該報告並研擬建議納入擬定綠色經濟策略過程之原則¹。

該報告依據過去經濟研究分析結果，建議投資於增加運輸系統之效率、改善住屋能源效率，以及友善環境之農作等項目，以期提升環境與人類之健康。除了保障基本權利和改善基本需求外，應進行行為的改變與使用型態的轉變（shifts in modalities），以避免因效率提升而增長需求，亦即避免反彈效果之產生（rebound effect）。而行為與使用型態的轉變則和社會資本中的規範與價值觀有關。

社會網絡方面的討論較為多見，涵蓋集資、網絡、以及社群等三面向。首先在集資方面，UNEP（2011）說明可透過基金提供集資借貸與經營管理模式等方法，資助開發中國家的企業家，以開發當地較具優勢或較獲需要的產業，例如村里規模之沼氣發電、滴流灌溉設備等。其次，網絡之建立可訊息傳遞，亦有利於前述事項之實行。而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2012）亦指出，以太陽能產品在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為例，除了投資初期所需資金外，配銷網健全與否則是能否獲得潛在客戶信任之關鍵因素。再則為社群之建立，該報告點出開發中國家的資源回收工作大多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進行，而單一個人之回收業者多具有較高之脆弱度，並缺乏支持網絡。家庭網絡雖能減低上述缺點，若能將這些個人組織成一團體將更能減緩前述衝擊。OECD（2011）也有類似論點，建議透過建立或改善網絡基礎建設，尤其是在能源、運輸、水資源和通訊等面向，其中運輸和通訊產業和網絡以及社群之建立和維持極為相關。

信任方面在既有國際組織相關文獻中的討論則涵蓋對於制度的信任，以及數位時代交易的信任度。European Commission（2010）即指出在政策與策略規劃方面，建議協助初級、製造與服務等產業，包括2008年經濟不景氣下受創較深的中小企業，讓這些產業能把握國際間綠色經濟倡議下所提供的機會。除了更新歐盟策略，鼓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以提升員工和顧客的信任度外，提升數位時代交易的信任度亦為歐盟相關政策擬定之要點。歐洲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4）亦引用2014全球風險調查報告（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指出全球治理的失敗、對於制度的不信任等皆是轉型至綠色經濟之阻因。

二、台灣

台灣在規畫綠色經濟發展時，即須將台灣特有的社會問題及能量納入考量。試問台灣社會固有或潛在資源為何？以世界上人口數超過一千萬的國家來看，台灣的人口密度僅次於孟加拉。而台灣的成人識字率98.0%，遠高於孟加拉的78.8%，就此而言，台灣人力資本素質應當也高。人口數量多，加上人口密度大，人和人互動的機會理應也高出許多，而形成社會網絡，以及衍伸出社會信任、規範與價值觀等類型的社會資本。

在和社會資本的關聯方面，台灣綠色經濟規畫過程中，建議政府致力於營造累積社會資本的環境，藉此加強綠色經濟論述中常被忽略之社會面。透過增強互信、社會網絡之維護與建立，以及相關社會價值觀和規範的維持與建立，開發和發揮存在於社會中之資本，得以降

¹ 原則有六：一、找出改善最貧窮者狀況的策略並排列優先順序；二、解析權力關係，並找出造成歧視或差別待遇之的根本因素；三、決策過程與目標應與國際人權標準一致；四、確保總體經濟政策之設計、各部門之倡議（sectoral initiatives）、治理之能力，以及透明度和可信度等原則之間具有高度關聯；五、在賦予積極主動、免費，和有意義的參與策略擬定之公民權與政治參與的權利方面維持一基本水準，包括資訊自由、結社自由，以及獲取解決方案之自由等；六、訂定指標和標準值，以確保社會經濟方面的權利之積極實踐可被清楚地監督。

低推行綠色經濟之交易成本，並增進相關策略的實施成效。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推動綠色經濟所規劃之政策目標如下（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蕭代基、黃德秀，2015）：

首先，在落實法定工時、增加與家人互動、參與社會網絡的時間等方面，應矯正在台實行時被扭曲之責任制，並落實法定工時、加班制度、休假制度等。當勞工加班之成本和效益能被確實納入決策考量，期能降低過長工時、提高休閒時間，以增進工作與生活之平衡。鼓勵增加與家人朋友相處之優質時間方面，除可直接增進工作與生活之平衡外，另可強化知識傳遞，以及惜物、社會責任感等價值觀的養成與延續。

其次，除了前述增加可運用於經營社會資本之時間外，另應降低阻礙社會資本形成之障礙。在促進民間社區和社群資源之有效運用方面，應協助社區和社群增進對外連結類型之社會資本、鼓勵民間組織多元發展以強化公民參與和知識傳遞。政府尤應協助弱勢社群增進對外連結類型之社會資本，包括了解降低連結力的因素，和發揮協調的機制。而透過鄰里以及其他社群之多元發展、善用公民覺醒，讓公民在先端即參與決策，有助於化解相關政策推行時可能產生的衝突，藉此強化知識傳遞、提升民間團體自主、發展地方特色，有利於進一步轉型為永續生產和消費模式。此外，現代科技之應用使社群之形成與聯繫更加便利，包括虛擬社群網路，或實體社群溝通的一項平台，藉此豐富化社群之形成、提升公民參與，並有機會降低形成社會資本之成本。

再則，於落實永續生產與永續消費方面，應提倡企業社會責任、倡導合作型/分享型消費型態，並倡導永續消費之觀念。永續生產端賴生產者的態度與技術，企業社會責任除了強調環境友善外，亦包括對於人與社會的關懷。一方面鼓勵生產高品質的產品，提升產品使用年限，以破解計畫性的報廢設計（planned obsolescence）；二方面在人力資本培育和組織管理時，強調對於人、社會與環境的關懷，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互信的養成。而透過合作型和分享型消費之提倡，推行共乘、共用、租用等，一方面可降低民眾經濟負擔和節能減碳，二方面可提供培養社會信任、公德心之機會，進而累積社會資本。部分合作型和分享型消費端賴公共支出的支持，例如公共腳踏車之設置；有些則可援用現有資源為基礎，例如保留既有或甚至增加公園綠地等分享型生活空間。公園綠地等分享型生活空間除了供給民眾休閒運動之場所，亦能作為民眾交流之場域，藉以加強社會聯繫。最後，永續消費觀念之培植亦有助於永續產品之推廣，進而促使永續產業之發展。換言之，消費者將品質、環境和社會友善等面向納入評估，而非以選擇低價商品或勞務作為首要考量。透過社區、社團、網路社群，以及媒體，提倡傳統惜物價值觀、社會責任感等觀念，亦有助於生活態度之改變，以利永續消費之推廣。

此外，在建立更廣泛且有效的公眾參與制度方面，信任的建立一則可仰賴互信普遍的社會氛圍，二則仰賴有效的雙向溝通。在普遍缺乏互信下，僅剩第二條路徑可行。粗淺的公眾參與，例如阿恩斯坦階梯之下層（Arnstein, 1969），僅會在被民眾識破後，加深其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感。為了增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信，應建立更廣泛且有效的公眾參與制度，讓各類群體都能有意義地介入及參與國家、區域、縣市，或社區之公眾事務。例如：為落實有效之公眾參與，可考量以聽證會取代公聽會。透過有效的雙向溝通，才可能對增進彼此間的互信有所幫助，進而將內耗的能量轉化為合作。

綠色經濟政策規劃小組為評估綠色經濟之實行，建議採取之量化評估指標如下：1）社會網絡支持比率（%）；2）與未同住朋友每週至少聚會一次的比率（%）；3）與未同住親人每週至少聚會一次的比率（%）；4）對時間分配在工作、家人、社會聯繫及嗜好均感滿意之比率（%）；5）志工服務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率（%）；6）對他人的信任（%）；7）家

庭關係滿意度(0-5)。上述除了第六項為衡量信任外，其他皆為衡量社會網絡之用。至於規範與價值觀，亦即永續消費和企業社會責任等價值觀，則僅見於規劃方向和質性指標，考量量化之成本以及指標資料之可取得性，亦未列於量化評估指標之規畫。

參、比較分析

本節針對國際組織與國內對於社會資本用於實行綠色經濟之評估面向與指標進行比較分析，比較分析之架構採取社會資本之三面向—信任、社會網絡，和規範與價值觀等進行比較。結果摘要於表1。

表 1： 國際組織與台灣評估社會資本用於實行綠色經濟之面向與指標之比較

社會資本	對象	國際組織	台灣
信任	業者	鼓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以提升員工和顧客的信任度 提升數位時代交易的信任度	提倡企業社會責任
	政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建立更廣泛且有效的公眾參與制度 • 增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信
	他人		對他人的信任
	社會網絡	家人	由家人支應之工作(如資源回收)
社會網絡	朋友		* 與未同住朋友聚會之頻率
	社區 / 社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協助社群增進對外連結類型之社會資本 • 鼓勵民間組織多元發展 • 志工服務 • 鼓勵善用現代科技，以降低社會資本形成之成本
	業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集資管道/平台 • 訊息傳遞管道/平台 • 配銷管道/平台 • * 將弱勢業者集合為一社群 	倡導合作型、分享型消費
	整體	基本人權之保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增加家人互動、參與社會網絡的時間 • 社會網絡支持比率 • 對時間分配在工作、家人、社會聯繫及嗜好之滿意度
規範與價值觀		提倡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應一併進行行為的改變與使用型態的轉變，以避免反彈效果的產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倡導永續消費之觀念 • 惜物、社會責任感等價值觀的養成與延續 • 提倡企業社會責任

首先，在信任方面，國內的規劃彰顯出國內政府與人民間的信任問題；國際則著重對於制度的信任，以及因應新興數位時代交易的信任。國內相對上較著重對政府與對他人之信任，強調應建立更為廣泛且有效的公眾參與制度、增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信等面向，對於業者信任方面的關注，尤其是數位時代交易尤其注重之信任則較為薄弱。國內規劃雖然鼓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以提升員工和顧客的信任，但針對電子商務等數位時代交易的安全及信

任度的提升等議題卻尚未被納入討論。尤其就目前綠色經濟規劃中的分享型等經濟活動模式多透過線上交易，資訊安全以及網路交易信任確實是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之餘的重要課題，以免徒增人類所面臨的風險。

其次，在社會網絡方面，國內規劃強調既有對內和對外連結類型網絡的維護，以及社群力量集結之促進；國際方面則著重產業面相關網絡之建立。國內規劃一方面關切對內連結類型之社會資本，較留心於增進與家人互動的優質時間，顯示對於家庭這類型傳統社會網絡之重視，二方面關注對外連結類型之社會資本，在考量和朋友互動的優質時間之餘，多著墨於社群社區等民間組織的發展和民眾參與。對於業者這個面向，僅討論合作型、分享型消費模式之倡導，和國際組織的討論相比則較顯薄弱。

國際間在社會網絡方面的討論多涉及網絡集資、實際配銷網絡，以及其他支持網絡之建立，和國內的討論相較，兩者稍有重疊處，然國際間對於水平網絡的討論多著重對外連結型，國內則是對外連結型和對內連結型兩者兼具，顯示台灣社會文化對於家庭作為社會單位之重視反應於綠色經濟規劃中。不過，台灣在對外連結型社會網絡方面的討論較重於社區社群，較少關乎業者者。以歐盟對於循環經濟規劃重視中小型企業之間的連結看來（European Commission, 2015），對於社會分配、政府和中小型企業相對於大型企業之議價力等有所助益，後者包括對於環境和社會面的永續議題。而台灣在規劃時對於中小型企業，以及較為弱勢之業者網絡、網絡集資，以及綠色新興產業實際配銷網絡的建立與維持等則較為缺乏。

至於如何改善整體社會網絡方面，國際間的討論多聚焦於基本人權、硬體運輸及通訊設施之建立等，國內在增進社會網絡的硬體基礎建設方面並非匱乏，問題多在於軟體制度方面，並以討論工時與公民參與等人權為主。基本人權涵蓋範圍甚廣，國際組織之報告除了可能為求討論之完整性外，亦可能是針對基本人權仍待提振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國內規劃對於工時與公民參與多加討論，則為台灣所面臨的問題與特質。

最後，在規範與價值觀方面，國際組織報告中建議運用規範與價值觀的改變以避免反彈效果，就方向上而言甚為正確，但對於實際推行策略則缺乏著墨。不過，規範與價值觀難以僅賴道德勸說，國內規劃對於增進惜物、永續消費、社會責任感等價值觀的養成與延續等擬借力於家庭等社會網絡。之於企業，則僅為提倡企業社會責任之類的道德勸說型建議，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仍須考慮結合社會網絡所能產生的成效，例如仰賴消費方透過個人、家庭或社群的行動，對企業形成壓力和影響。

此外，上述三類型的社會資本之間亦有互利之處。像是綿密的社會網絡有利於規範與價值觀之傳遞，如台灣傳統的家庭單位所具備的功能，但若缺乏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對於整體經濟發展將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台灣在面臨社會信任低落的同時，如何透過實際參與而提振社會信任，將是綠色經濟等發展規劃能否有效推行之關鍵。此外，相較於國際間對於運用規範與價值觀的改變以避免反彈效果之大方向規劃，國內規劃借力家庭這類社會網絡，以增進惜物、社會責任感等價值觀的養成與延續是為特點。借力於家庭，並非僅依賴家庭這個社會網絡，力促中小型企業、較為弱勢之業者，及社群社團等專業化單位之連結亦有助於集結智慧、凝聚共識、傳遞對於社會與環境負責的能力與價值觀，並擺脫如福山所言受制於家庭單位的缺點（Fukuyama, 1995）。

綜合而論，國際報告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較為零散，鮮見結構性探討社會資本運用於發展綠色經濟者，而即使如UNEMG（2011）討論社會資本之專章亦僅以改善基本人權為主軸。而台灣在規劃綠色經濟時則已結構化，以本文分析所引用之Putman et al.（1993）所提出之三類社會資本作為結構。就綠色經濟而言，國際組織之報告許多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所提，

國內在進行政策規劃時若一味依循之，恐怕徒勞之餘，亦未能善用國內特有資源以解決特有問題。

肆、 結論

綠色經濟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國際間對兼顧環境與社會正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之反思，此倡議提供了另類發展模式之討論空間。長期以來對於土地與其他自然資源等開發行為，以及近期以壓低成本為主之商業模式等，皆是人類社會恃以提升福祉的發展模式，而針對社會固有或社會潛在資源的開發，如社會資本在發展模式之應用，相對上則較少著力。此外，就功能而言，社會資本具有降低交易成本與影響典範移轉的潛力。

本文透過國際組織與國內對於綠色經濟規劃之比較分析，以信任、社會網絡，以及規範和價值觀等三類型社會資本作為架構，嘗試釐清台灣在規劃發展綠色經濟時對社會資本運用之討論是否充分。

首先在信任方面，面臨電子商務與網路交易頻繁的時代，包括對於綠色經濟有所助益的分享型經濟模式，除了留意集資、訊息傳遞、配銷，和社群等和業界有關的網絡運作之效率提升及其正當性外，提升數位時代交易的信任度在歐盟相關報告屢見著墨，這是國內尤其缺乏之處，包括對於如分享型經濟等新型商業模式之管理，以及對於電子商務之因應。

其次就社會網絡而言，國內對於如何增進社會網絡之運作的討論多和工時與公民參與有關，國際組織的討論則聚焦於基本人權。若就分享型經濟模式而言，尤其是電子商務及網路交易所涉及之隱私權等基本人權，亦是台灣未來精進綠色經濟或相關發展規畫所應關注課題之一。而透過網路等管道進行分享型經濟之必要性及唯一性也應列入討論，以避免在提升效率的同時，致使所得不均更加惡化，或因廣設伺服器農場或處理大數據而加速資源之耗費，亦即再度落入反彈效果模式中。

再則就規範與價值觀來說，國際間的規劃看到了運用規範與價值觀的改變以避免反彈效果之可能性，這是國內規劃可學習之處。此外，國內規劃希望借力既有之家庭這類社會網絡，以提倡相關價值觀，對於產業方面的規畫較為薄弱，宜力促中小型企業、較為弱勢之業者，及社群社團等專業化單位之連結，以利共識之凝聚，以及對於社會與環境負責的能力與價值觀之傳遞。

台灣在冀望發展綠色經濟的同時，宜將台灣特有的社會能量和條件納入規畫之考量，致力於建立和改善累積社會資本的環境，藉此加強綠色經濟中容易被忽略之社會面。長年位居外國觀光客正面印象排行榜之列的台灣人的熱情與溫暖，以及傳統文化中以家庭為重、尊敬長輩、疼愛後進等價值觀，皆是這個社會特有的資產。歐美福利國近年隨經濟不景氣，刪減社會福利項目，失去社會福利支撐者，苦於無家庭鄰居相互照應之網絡與倫理作為後盾。在家庭和社群之間的網絡和價值觀尚稱普遍的國家中，若不保存和傳承這些資產，甚為可惜（Chang 2010；張瓊婷2013）。在如本文所討論的綠色經濟等類型的經濟發展規劃中，若不能善加運用這些資本，只是一味跟從所謂國際趨勢，在平白浪費資源之餘，多只能長久處於在後頭追趕的角色。

台灣的經濟發展規畫應妥善運用社會既有資源，而非一味追趕國際潮流。以台灣對綠色經濟發展之規畫為例，有賴政府致力於建立和改善累積社會資本的環境：一是透過合理工時及人民團體法的鬆綁，增進優質互動時間與降低社群互動之阻礙，串聯並運用社會既有資源，以借力家庭，並力促中小型企業、較為弱勢之業者，和社群社團等專業化單位之連結；二是分享型經濟等新型商業模式之管理，和對於電子商務之因應，包括交易所涉及之隱私權等基本人權保障與教育，在追求效率之餘應捍衛共享價值，以提升數位時代交易的信任度；三是將數位時代交易的必要性及唯一性列入政策討論，以避免所得不均之惡化，或加速資源耗費，而再度落入反彈效果模式中。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1.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3）。2012年社會指標報告。取自：
<http://ebook.dgbas.gov.tw/ct.asp?xItem=34917&ctNode=5971&mp=103>。
2.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2015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取自：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8850&ctNode=4987&mp=1>。
3.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國家發展委員會102年度推動綠色經濟專案計畫委託辦理案總結報告。計畫編號：CEPD102021。取自：<http://greenecon.cier.edu.tw/p07.htm>。
4. 張瓊婷（2013）。人一造幸福：看見社會面的福爾摩莎。鉅變新視界。創刊號。取自：
<http://rsprc.ntu.edu.tw/zh-TW/component/content/article/9-articles-category/social-innovation/12-social-aspects-of-formosa>。
5. 蕭代基、黃德秀（2015）。扭轉人類永續發展危機—淺談綠色經濟。經濟前瞻，第157期，頁39-44。

英文文獻：

1. Acemoglu, D. and J.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 Arnstein, S.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35 (4): 216-224.
3. Barbier, E. (2011), "The policy challenges for gree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35: 233-245.
4. Borel-Saladin, J.M. and I.N. Turok (2013), "The green economy: Incremental change or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3(4): 209-220.
5.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241-258.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6. Brand, U. (2012), "Green economy the next oxymoron?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failures of

-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21(1): 28-32.
7. Chang, C.T. (2010), “Viewpoints on sustainable supply and consump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34: 87.
 8. Coleman, J.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9. Coleman, J.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 Davenport, M.A., Leahy, J.E., Anderson, D.H. and P.J. Jakes (2007), “Building trust i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within loc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Midewin national Tallgrass Prairi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9: 353-368.
 11. Dowla, A. (2006), “In credit we trust: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by Grameen Bank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5: 102-122.
 12.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UROPE 2020: 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1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Closing the Loop – An EU Action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14.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3),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in Europe: EU environmental policy targets and objectives 2010–2050*.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15.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4), *Resource-efficient green economy and EU policies*.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16.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7.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18. Hamdouch, A. and M.H. Depret (2010), “Policy integration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economy’: fou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53: 473-490.
 19. Hirschman, A. (1984), “Against parsimony: three easy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74 (4): 89-96.
 2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2012), *Working Towards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decent work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 green econom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21. Jacobs, J. (1961), *The Life and Death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London: Rondon House.
22. Laville, J.L. and M. Nyssens (2001), "The social enterprise: Towards a theoretical socio-economic approach," in Carlo Borzaga and Jacques Defourny (ed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 pp. 312-332, London: Routledge.
23. Loury, G. (1977),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P. Wallace and A. LaMond (Ed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pp.153-188,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24.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Towards Green Growth*. Paris: OECD.
25. Pearce, D.W., Markandya, A. and E. Barbier (1989),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26. Perkins, D.H., Radelet, S., and L.L. Lindauer (2013),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7th ed., New York: Norton.
27. Putnam, R., Leonardi, R. and R.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8. Putnam, R.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9. Stiglitz J.E., Sen A. and J.P. Fitoussi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 Accessed on 31 January 2014.
30.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Management Group (2011), *Working towards a Balanced and Inclusive Green Economy*. New York: UNEMG.
31. Wagner, C.L. and M.E. Fernandez-Gimenez (2008), "Does community-based collaborative resource management increase social capital?"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1 (4): 324-344.
32.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Global Risks 2014, Ninth Edition*.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33.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2011),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New York: UNEP.